

当文物普查来到新疆 无人机飞跃无人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

“前段时间，我们在文物普查时遇到了沙尘暴，后来安全撤到了塔中镇。”新疆和田地区文旅局文博科科长、普查队长买提卡斯木·吐米尔说。当时全队的给养只剩下两箱矿泉水，在普查队距离塔中加油站还有50公里时，汽车指示灯亮起，提示燃油即将耗尽。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买提卡斯木·吐米尔叙述的语气却十分平静，“这个沙尘暴不算大，还好圆满完成了普查任务”。

在霍尔果斯市文旅局文博科科长，“四普”队长张慧玲看来，文物普查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情怀。2024年，霍尔果斯周边的山区蝗虫肆虐，普查队每次吃饭都是一场“时间竞赛”。一碗方便面，打开吃一口就得赶紧盖上，否则蝗虫就会跳进去。

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启动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00余名普查队员越草原、探幽谷、攀险峰、入沙漠，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文物工作者的担当。截至4月28日，全区共调查不可移动文物11109处，其中复查“三普”文物9165处，新发现文物1944处。

越野车、骆驼、马匹齐上阵

在库安迪尔河下游、尼雅河中下游以及喀拉喀什河古支流雅瓦河下游的区域，曾经有一条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即丝绸之路南道。这些区域存在一些古文化遗存，可能分布着重要的历史遗迹，对于了解和田地区古代文明具有潜在的研究价值。如今，它们因地处沙漠腹地难以到达。2025年，新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协调工作机制办公室组织开展了荒漠无人区等专项调查，买提卡斯木·吐米尔带领的普查队便参与其中。

买提卡斯木·吐米尔经历过“二普”“三普”，这次又参与了“四普”。常年深入沙漠中考古，他对这样的极端环境已习以为常。每次出发前，他和普查队员都会作好充足



文物普查队在吾勒肯布勒合岩画开展文物普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的准备，不仅带上办公设备，还要准备充足的食物、水、药品等；不仅开越野车，还会带着骆驼拉上物资共同上路。在沙漠中遇到沙尘暴是常事，有人问：“这么大的沙尘会影响工作进度吗？”他回答：“再影响也得干，不然给养不够支撑计划好的天数。”多待一天，队伍在沙漠里用的、吃的、喝的就要增加。沙漠里没有信号，每日通过卫星电话发给单位“安全”。仅有两个字的短信，是普查队和外界的全部联络。

文物普查，沙漠不是唯一的难题。很多植被丰富的山区，开车也难以抵达，只能徒步或骑马。张慧玲记得第一次骑马去普查时，道路狭窄，两边都是悬崖。其间，一匹马受惊致使一名同行人员跌落，出于安全考虑，普查队员全部改为徒步前往。由于很多普查点位置偏远，缺少信号源，张慧玲所在的普查队办理了电信、移动、联通等几乎所有电话卡。到一个地方，哪个手机有信号，就用哪个手机采集并上传信息。

人人都是文物守护者

即便在没有外界干扰、拥有充足资料的情况下，有时想要复核“三普”文物也并不容易。清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伊犁

条约》签订后，双方重新勘界，清政府在边界设立卡伦，契格爾干卡伦为其中之一。霍尔果斯市文旅局文博科干部、普查队员严淦回忆，契格爾干卡伦在“三普”时被登记为消失，在“四普”时，她和队员根据舆维地图，找到该遗址“三普”登记的定位处，发现

记者手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

“这是货真价实的‘沙瓢’瓜！”看着手里的西瓜，同行的小伙伴感叹。此“沙”非彼“沙”，这里的“沙”指的是沙漠中的沙子。

日前，跟随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基层行，记者来到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体验当天文物普查员。风沙是那天最直观的感受：相机拿出不到30秒，沙子就在屏幕上盖满了一层；即便是放在帐篷里的食物，也会被沿着缝隙吹进去的沙子包裹。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名气如雷贯耳。沙漠到底有多干？除了



吾勒肯布勒合岩画。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新疆和田地区文旅局文博科科长、普查队长买提卡斯木·吐米尔在丹丹乌里克遗址进行文物普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当地没有和文物一致的环境。在周边经过两天的寻找，他们才看到有一个地方与该遗址基本符合。咨询相关专家后，确定这里就是契格爾干卡伦，现已对该遗址“三普”数据进行了修正。

文物普查和保护不只是普查队员的

在塔克拉玛干寻找唐朝

沙子，沙漠里还有什么？很多人对它充满好奇，但其艰苦的环境也让人望而生畏。而对于新疆文物普查员来说，深入沙漠腹地已是常事，为了核查距离绿洲较远的文物，连续多日住在其中也不少见。

我们这次跟随普查员进入的丹丹乌里克遗址，距离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玛力喀勒千村北80千米，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经过发掘和考证，该遗址被确定为唐代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杰谢镇”故址，是唐安西都护府治下安西四镇中于阗军镇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准备工作从一大早就开始了。普查队员们不仅要携带工作用具，还要准备包括

水、食材、药品等在内的生活物资。沙漠特殊的地貌对司机和用车也提出了高要求。每位司机都需拥有丰富的野外驾驶经验，车辆均为越野车，否则难以穿行。普查队员告诉我，很多时候他们还会带骆驼一同前往。

当天我们从策勒县出发，路上沙子覆盖不匀，颠簸不断，约160公里的路程开了将近3个半小时。到达停车点后，大家还要再步行近两公里才能到达遗址。里面沙丘众多，不仅行走费力，视线还常被遮挡，和周围人稍微拉开距离，便看不到彼此。沙漠辽阔，个人渺小，行走期间记者一度觉得心慌，担心迷路。

普查结束回到帐篷时，记者鞋内近一

技术不断迭代，精神代代相传

此前已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2023年11月起开展。普查总体目标是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建立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立文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完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公布机制，规范认定标准和登记公布程序，健全名录公布体

系；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机制，构建全面普查、专项调查、空间管控、动态监测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理体系；培养锻炼专业人员，建强文物保护单位队伍，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

张慧玲已从事文物保护工作30余年，曾在“三普”中主要负责测量绘图的工作。“那时主要靠人工测量绘图，精确性是最头疼的问题，现在有了高科技工具，绘图方便多了。”

科技的进步也是买提卡斯木·吐米尔感受到的主要变化之一。以前的设备很简单，定位的坐标会有一定的误差。现在不仅有RTK技术（一种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能够在野外实时获得厘米级的定位精度——记者注），还配有无人机，收集到的数据更准确。

技术不断迭代，对于文物保护的精神在青年身上代代相传。来自新疆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王股杰，自4月起加入荒漠无人区专项调查，主要负责文物样本的采集、描述与绘图。

来到沙漠之前，老老师告诉王股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子如水，到处都是，深入腹地后才深切体悟这样的形容。“晚上睡觉时，你可能觉得什么都没有。第二天一早醒来，你会发现，你的睡袋里和周围都是沙子。”他觉得“四普”有意思更有意义，坚定了以后继续从事考古行业的决心。

郑志琦是一名00后，两年前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加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也参与了本次荒漠无人区专项调查。“不论是文物普查还是文化遗产保护，都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他表示，很荣幸有机会参与“四普”，希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向前辈学习而不断进步。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半的空间被沙子占据，脸、手、头皮也全被沙子覆盖。而这在普查员们看来还算可以，他们给我看了在恶劣天气下拍的视频：狂风肆意，飞扬的沙子将天地变为一色，睡袋在地上无助地被沙尘一次又一次掩埋。

有人问：“环境这么恶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遗迹呢？”普查队员回答：“在遥远的古代，这里曾经十分宜居。”

沧海桑田，但仍不乏探寻前人遗迹之人，或许这就是文物普查的意义吧。

超越文献意义成为精神图谱

现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青春之歌》手稿，已超越文献意义成为精神图谱。2024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离手稿展柜不远处的读者留言簿上，“愿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的留言与手稿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互动印证了经典文本的再生能力。当“林道静”们在银幕上高唱《五月的鲜花》时，手稿中涂抹的墨迹早已化作文化基因，融入民族精神血脉。

杨沫晚年将手稿与版权无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她说：“我们不是为了金钱而写作，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写作。我们的笔尖凝聚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的深挚的爱，凝聚着对真理、对人类进步事业深深的爱与向往。”这种将个体创作视为集体精神财富的认知，恰是《青春之歌》超越时代的根本价值。

《青春之歌》手稿作为特殊的历史文本，既是作家创作心路的精神见证，更是解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密钥。手稿中那些被删改的片段、增补的批注，不仅记录着作家个体的思想跋涉，更折射出整个民族在救亡图存中的精神觉醒。

当数字化浪潮席卷文献研究时，泛黄稿纸上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依然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文学经典，永远在与人的心灵对话中获得新生。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1958年，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甫一问世，即以磅礴的青春激情与鲜明的革命叙事引发轰动。这部以“九·一八”至“一二·九”为背景的作品，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部正面描写知识分子革命成长的长篇小说，更以手稿为载体，承载着作家个人生命经验与时代精神的深刻交融。

从手稿的反复删改中，我们得以窥见杨沫如何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间权衡，如何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精神的史诗。茅盾曾评价其“真实且有典型性”，邓颖超更坦言读至“忘食”，是“一部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

曾命名为《烧不尽的野火》

《青春之歌》的创作始于1951年，历经7年修改，手稿中密密麻麻的删改痕迹，印证了杨沫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反复权衡。手稿首页显示小说曾命名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定名《青春之歌》，这一演变过程暗合作者从个人化叙事向集体记忆书写的转向。

杨沫早年抗婚离家、投身革命的经历，与林道静从迷茫少女到革命战士的成长轨迹高度重合。手稿中林道静参加学生运动、狱中觉醒等情节的细节增补，均源于作者在冀中抗战时期的亲历见闻。杨沫曾回忆，

开栏的话

在历史长河中，文物是凝固的史诗，承载着民族精神的基因图谱；文学则是流动的星河，激荡着时代的文化血脉。

中国新文学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激荡中一同诞生的，二者都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历程中的必然产物，中国新文学发轫伊始就拥有强烈的红色基因。

斑驳的书页间跃动着鲁迅的《呐喊》，泛黄的手稿中封存着茅盾《子夜》的深思，褪色的战旗上浸染着巴金《赴朝日记》的烽火。这些见证革命历史、彰显革命精神、继承革命文化的实物遗存，既是文人风骨的见证，亦是解码革命年代精神肌理的密钥。

本专栏以“以物证史，以文传魂”为宗旨，响应“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命题，依托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手稿、书信、图书等革命文物资源，通过解读文物中的文学密码，解析革命年代集体信仰的精神图谱。

战友在战斗中接连牺牲，这些鲜活的生命成为她“必须写出来的丰碑”。

作品中卢嘉川就义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令人动容，这种创作自觉使得革命叙事既具理想主义色彩，又不失人性温度。茅盾在分析林道静形象时指出，其“幻想与温情”的流露并非小资情调，而是知识分子真实的精神轨迹。

初稿中余永泽被塑造成纯粹的反面角色，定稿则增添其资助贫困学生、痴迷国学等复杂性的描写。这种改动不仅避免人物脸谱化，更隐喻着新旧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的分化。林道静与余永泽分手时的片段，既有对旧式婚姻制度的控诉，又隐含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反思，呈现出革命叙事中罕见的伦理张力。可见在“革命的洪流中，有人成为砥柱，有人沦为沉沙”，这种辩证思维使小说超越简单的阶级斗争框架，触及人性深度。

文学史意义远超文本本身

作为新中国文学史上首部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文学史意义远

诗说新语

桃花与诗的故都

的必经之路。伴随着周公旦营建洛邑，河南西南部至江汉平原北部拥有了《诗经》中“周南”这一地名，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正是其中人所熟稔的名句之一。

考古证据显示，西周初期华北已经出现桃的栽培品种，但“桃林”这样的地方或仍以野生品种为主，果实的鲜美与后世有很大差距。先秦时代的良种桃大概极为稀缺，否则春秋时“二桃杀三士”的逻辑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

西汉时期，北方桃树的人工培育取得很大进展，新品种层出不穷，甚至伴随丝绸之路远传至西域。唐代史家专门记录一笔的撒马尔罕金桃，就是中原品种在中亚再度改良优化的成果。随着良种和桃树经济价值的不断凸显，大面积人工栽培成为可能。

西晋时，那位少年时因丰神俊朗而被首都仕女围观的潘岳，在河阳县（今洛阳市孟津区境内）任职，下令百姓在洛阳城北的丘陵山地广种桃树和李树，这一可能原本出于改善百姓生计考虑的施政措施，使河阳地区外获得“花县”的美誉，桃花的观赏性在此凸显。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甚至将“河阳一县花”与“金谷满园树”相提并论。

金谷园是潘岳政治盟友与文学同道石崇在洛阳城郊的园林别墅，与河阳县隔黄河相望。石崇是著名富豪，对金谷园的打造

不遗余力，自称“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其中的“众果”，应包括桃树。

中古洛阳屡遭兵燹，城内外的园林营造则不断推陈出新，其间桃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孝文帝迁洛后营造的华林园中，“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彻，得霜即熟”，据说即是王母蟠桃的人间变种。

以果实为主要产品的桃树不可能单独栽种，至少要连片成林。这份春天的遗产延续到唐朝，洛阳城内外的座座桃园，在青砖飞檐与烟树茱萸之间织出片片红霞。如能在白居易栖居的香山向北极目远望，河阳的烂漫花海在天际涌动着压倒性的氛围。

我们有理由猜测，当少年王维以一首七言古诗《桃源行》致敬陶渊明、写下“两岸桃花夹古津”的句子，脑海浮现的或许就是洛、伊二水两岸的无边春景，是《洛阳女儿行》中遍布廊下檐前的艳丽桃花。

充盈一切的桃林是青年诗人的留驻之地

作为观赏花卉，桃花花型较小，与牡丹的丰满富丽相形见绌；但由于其花序密度甚大，加以规模化的栽种，远观整体效果更

令人震撼，正如唐代诗人吴融所谓“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桃花明艳的色彩只有在灿烂的阳光下更得其宜，是以“桃红复含宿雨”远不如“雨打梨花深闭门”脍炙人口。

三四月的洛阳降水不多，暖阳熏风中的烂漫桃林成为春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非少数阶层所能垄断。唐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发育尚不充分，堪与现代大型商业复合体媲美的洛阳南北市，只是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想象；城中坊墙遮不住的桃花与城外原野看不尽的桃林，才是凡人目光在那个远去时代的留驻之地。

武则天时代，洛阳一度成为王朝中枢的常驻地，对神都繁荣的吟咏诗篇迅速增多，“洛阳城东桃李花”的歌唱压倒了“长安大道连狭斜”的描摹。年轻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贯穿了对桃花的书写与感叹，芳树下的公子王孙与落花上的清歌妙舞，共同形塑出诗篇的华彩乐章，冲淡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慨。这不是竹外三两枝的桃花，而是漫山遍野、充盈一切的桃花，触手可及的青春在其中理所当然地张扬着舞步，似乎可以伴随时空无限延展。美少年与白头翁，青春与衰老的张力并存，而诗人心中的青春力量终究更胜一筹。

在照明工具尚不发达的时代，夜晚的大



杨沫《青春之歌》手稿封面与首页，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藏，一级文物。作者供图

的美学建构提供新路径，其影响可见于杨沫的后续创作。

在人物塑造上，杨沫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贯穿始终，并有创新尝试。如卢嘉川的原型源于冀中抗战烈士，其就义场景从手稿中寥寥数笔，到定稿时扩充为充满诗性光辉的篇章，这种从史实到诗意的升华，使革命叙事摆脱了概念化窠臼。而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幻灭、与卢嘉川的精神共鸣、与江华的志同道合的3段情感经历，则构建起“爱情-革命”的双重叙事结构，为红色经典的情感表达开辟新路径。

桃花为历史投射出更为复杂的色彩

洛阳城中的桃花并非都以祥和安适的态度开放，也不总是青春与繁荣的注脚。李贺用“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著名开篇描写洛阳春天，却紧接着“花城柳暗愁杀人”的句子，“暗”与“愁”的使用给春天赋予了几分诡谲的气息。从长时段观察，这种诡谲其实是中古时代洛阳的另一种常态。

西晋末年，意气骄奢的石崇在52岁时被政敌谋杀，为其殉情著名的歌姬绿珠从金谷园的高楼一跃而下。500年后的杜牧在凭吊时不无伤感地说道：“落花犹似坠楼人。”这里的落花不一定是桃花，却符合桃林飘落时的风格：万点飞红飘然委顿，古都春天的每次离去都有着一去不复返的决绝。



洛阳紫荆山桃花。视觉中国供图

张景平

又是一年赏花期。说起古都洛阳的名花，首先跃入脑海的一定是“甲天下”的牡丹；牡丹的雍容，又象征着盛唐那样的繁华时代。今人很少注意到，牡丹盛放之前，中古时代的洛阳已经被另一种绚丽所浸染，那就是中原大地上盛放数千年的桃花。

中古洛阳，夭桃遍野

考古发现业已证明，桃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树种。将桃树果实作为食物的历史似乎由南方开创，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即有野桃核出土。桃作为食物进入中原的历史似乎要略晚，距今3000年的安阳殷墟遗址中还未发现桃核的影子。

到西周时期，桃树在洛阳盆地周边已屡见不鲜。武王崩商凯旋，“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桃林”作为一个写实的地名，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与陕西省潼关县之间，是洛阳盆地通往关平原